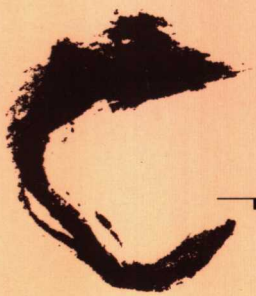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 赵卫东 著

分判与融通

—— 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

齐鲁書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赵卫东 著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分判与融通

—— 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赵卫东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6.6

ISBN 7-5333-1685-1

Ⅰ.分… Ⅱ.赵… Ⅲ.新儒家-研究-中国-现代 Ⅳ.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973 号

分判与融通

——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

赵卫东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2 插页 322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685-1

B·221 定价:29.00 元

总　序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谱写出了无数的灿烂辉煌。诞生于先秦时期齐鲁大地上的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齐鲁大地上涌现出了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科学家和学者，他们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通过自己的勤劳、聪明和智慧，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涌现出了以孔子、孟子及其儒学，孙子及其兵学，邹衍及其阴阳五行学，管子及其学说等为代表的各种学派。齐鲁文化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成为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对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仍然有很好的借鉴与启迪作用。研究和探讨齐鲁文化，使之古为今用，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责任。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深入研究、探讨和弘扬齐鲁文化为己任。《齐鲁文化学术文库》是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设置的系列重要研究课题。其内容涵盖齐鲁文化研究的多个层面，除了理论研究以外，也包括应用性的研究。承担《文库》中各书的作者，都是在齐鲁文化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既有学识渊博、造诣深厚的

老一辈学者，也有朝气蓬勃、根基扎实的年轻一代学界新人。所列入文库的，都经过多位同行专家的审定，其内容不仅严肃、认真，而且具有创新性。但愿这一套《齐鲁文化学术文库》的出版，能为各阶层人士学习、研究和探讨齐鲁文化起到帮助作用，对齐鲁文化的发扬光大产生积极的效果。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编委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总　序 …… 1

引　论 …… 1

第一章　传统儒家处理德性与知识关系的方式 …… 26

第一节　原始儒家对德性与知识的合一与贯通 …… 26

第二节　宋明儒学对德性与知识的区分和重德轻智倾向的形成 …… 56

第二章　20世纪德性与知识关系问题的凸显 …… 97

第一节　文化的冲突与生命的困惑 …… 97

第二节　生命的困惑与形上的解决 …… 105

第三节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两难抉择 …… 117

第三章　张君劢对道德与知识的并重并行 …… 136

第一节　道德与知识的分野与反智主义的倾向 …… 138

第二节　道德与知识的并重并行 …… 144

第三节　由新理智以达于新道德 …… 147

第四节　尊德性与道问学、
穷理与致良知的合一…… 151

第四章　梁漱溟对德性与知识贯通的理论尝试…… 155

第一节　德性与知识的双弃双遣…… 157
第二节　由直觉转变出理智…… 161
第三节　由理智上升到理性…… 176

第五章　熊十力对德性与知识的双向贯通…… 193

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区别与会通…… 200
第二节　科学与哲学的分疏与相需…… 210
第三节　体用不二而毕竟有分…… 219
第四节　性智与量智并行而不相悖…… 235
第五节　仁智之别与仁智合一…… 244
第六节　致良知与格物穷理的统一…… 266

第六章　牟宗三对德性与知识的贯通与圆融…… 291

第一节　客观面的确立与新外王的开出…… 293
第二节　智穷见德…… 351
第三节　良知自我坎陷…… 392

结　论…… 434

参考文献…… 444

后　记…… 456

引　论

哲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学。虽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而且中西形上学也有根本的差别，即中国的形上学偏向于价值论，属“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而西方的形上学更偏向于存有论，属“存有形态的形上学”。但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却都以形上学作为最高追求与最终归宿。

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的确立，应归功于亚里士多德，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第一哲学”，才使形而上学从科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具有了“科学之科学”的尊贵地位。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却不始于亚里士多德，早在亚氏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形上追求之路。自然哲学时期的哲学家们对宇宙“本源”或“始基”的追寻，早已有了形上意味，而其后巴门尼德的“存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以及柏拉图的“至善的理念”则已经是形上实体。自亚氏之后到康德之前，形而上学一直是“一切科学之女王”，但到康德的时候，形而上学却作为“无止境的争辩之战场”，而成了“一个被逐出并被遗弃的妇人”。① 虽然许多持拒斥

① 牟宗三译注：《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之《第一版序言》，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修订版，第11～12页。

形上学立场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习惯于把康德视为自己的始祖，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否定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而是藉现象与物自身的严格区分来为形而上学正名。康德言：

> 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①

正因为康德本质上是一位形而上学家，所以试图超越康德的谢林、费希特、黑格尔等，却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建构了自己的形上学体系。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界充斥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形上学似乎陷入在空前的低潮之下，谈形上学几乎变成了一种禁忌。但形上学的问题并没有真的死绝，它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②。存在主义与实证主义无疑是反形上学的最得力干将，然而，不仅实证主义者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与困扰，“在反形上学的外表之下也还不免有着某种形上学的基设”③，而且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最重要代表之一的海德格尔，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因为海氏不仅明确承认“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④，而且还言：“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被用来称谓所有

① [德]康德著，庞景仁译：《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63 页。

② 刘述先：《形而上学序论》，见刘述先著《中西哲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版，第 278 页。

③ 刘述先：《形而上学序论》，见刘述先著《中西哲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版，第 266 页。

④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152 页。

哲学的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①]与康德一样，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也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而是要为形而上学开辟一条新的道路。[②]

虽然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但不能藉此来否定中国古代哲学家曾经进行过形上的思考。老庄哲学中"道"的形上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重人事而轻天道"的原始儒家，也提出了"天"、"天命"、"诚"、"本心"、"太极"等极具形上意味的哲学命题。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学术指归的汉代哲学，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与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无疑是一种形上的追求。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的重心由汉代的天人关系转变为有无之辨，从而完成了中国形上学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型。在佛道两教的刺激下，宋明儒家汲取佛道理论之精华，开始自觉建构自己的宇宙本体论体系，其所提出的理与气、道与器、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道心与人心、良知与私欲等一系列命题，无不是形上与形下关系在不同问题上的反映；而其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工夫理论，也内在地蕴涵着由形下向形上的超越。

不管在西方哲学史上，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是哲学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立足于自己所生存的时代，针对其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然而，作为哲学家，他们并非就现实问题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要把现实问题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解决。从这一意义上讲，

① [德]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9 页。

② 刘述先：《形而上学序论》，见刘述先著《中西哲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版，第 280 页。

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必须同时具备时代性与超越性，时代性是其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个性，而超越性则是其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共性。不立足于其所生存的时代，哲学家就不能提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不超越其所生存的时代，哲学家又不成其为哲学家。因此，金岳霖先生言：治哲学的人必须要达到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非名言之域”，“假若他不是这样，他或者不治哲学，或者虽治哲学而根本没有哲学问题”①。金先生所谓的“非名言之域”即是形上之域。显然，他把是否达到形上之域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哲学家的标准。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群体，当代新儒家正是靠对时代问题超越的解决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哲学家。②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即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由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以为“现代化”即“西方化”，而西方的优长之处即在于科学与民主。因此，“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就转变为了“如何在中国开出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主要生存于20世纪的当代新儒家

① 金岳霖：《势至原则》，见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页。

② 对于何人堪称当代新儒家或现代新儒家的问题，学界颇有争议，本人赞同颜炳罡先生的观点。颜先生曾经多次论及这个问题（请参看：《当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文史哲》1994年第4期；《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9页；《生命的底色》，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73页），虽前后有些差别，但最近出版的《生命的底色》一书，应该能代表颜先生最新的观点。在《生命的底色》中，他言：“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马一浮、钱穆是当代儒家，贺麟的儒学贡献不足以成‘家’，冯友兰主观上欲成就新儒家，然而其理论基点不在儒家。当然当代新儒家是一开放系统，它仍然在发展、演化中，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余英时等正值学术盛年，这里暂不置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者，以儒家知识分子历来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的使命感与担当感，积极承担起了在理论上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历史重任。但当代新儒家学者作为哲学家，并没有就现实本身来解决这一时代课题，而是把其提升到了形上学的高度来思考，从而各自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当代新儒家看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上生成与发展起来的，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并不一定能适应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与社会状况，中国的科学与民主必须从中国文化中开出，并由此提出了“返本开新”，即“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模式。但科学与民主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要从中国文化中把它们开出来，首要的难题便是中西文化的契接。因此，这一时代课题便被提升为了中西文化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型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理论理性或认知理性型的文化，由此，中西文化的契接问题便转化为如何从道德理性中开出认知理性的问题。道德理性是成就道德的内在根基，而认知理性则是知识产生的前提，道德理性与认知理性之间的关系即道德与知识的关系，由道德理性中开出认知理性即是由道德中开出知识。但道德与知识分属于不同的领域，道德属于价值领域，而知识则属于事实领域，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如何契接到一起呢？而又如何从一个开出另一个呢？当代新儒家立足于其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或儒家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把中西文化的问题进一步转化为了形上与形下关系问题，即中国文化是形上的，而西方文化是形下的。然而，道德与知识虽属不同领域，但却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很难有形上与形下的区分，因此之故，当代新儒家又把道德与知识之间的平行关系，转化为

了德性与知识之间的纵向关系。本来德性与知识不属于同一层面，不可以相提并论，但由于当代新儒家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视为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从而使德性与知识具有了相提并论的可能，这也是本书把德性与知识并提的原因。

"德"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较早，西周初年，"以德配天"与"敬德保民"观念的产生与流行，使"德"字在周初文献中俯拾皆是。《说文》言："德，升也。"但历代学者，却少有以"升"释"德"者，而大多数学者以为"德"字古为"悳"字，《说文》言："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但也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比如徐复观先生认为，"悳"字当为后出，因为在《尚书》等古文献中，多以心与德对举，当时的"德"字尚未与心有必然的关联，"从直从心"而且"内得于人"的"悳"字，必为后出无疑。徐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为了论证周初"德"字尚未有内在性义涵，然而，以"悳"字为古"德"字，实际上与其所主张的周初"德"字无内在性义涵的观点并不矛盾。

在新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并无"德"字，而是以"悳"代"德"。比如，《老子》甲本中言："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其中"德"即写为"悳"，其他儒家经典，如《缁衣》、《忠信之道》、《唐虞之道》、《五行》、《穷达以时》、《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其中的"德"字也皆写为"悳"。[①] 假若如考古学家所言，郭店楚简确为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②]，那么，在战国中期以前，可能并无"德"字，而

① 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李学勤先生言："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〇〇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参见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 页。）

只有“悳”字。因此，事实可能与徐先生所言恰恰相反，并非“悳”字晚出，而是“德”字晚出。而“悳”为“德”之古字，并不影响徐先生的观点，因为晚出的并非是“悳”这个字，而是《说文》中的解释。许慎很可能是以汉时“德”字的涵义去诠释“悳”字，而汉时“德”字继承孔孟“德”字之义，已经有了内在性义涵，许慎以“外得于人，内得于己”释“悳”字，实际上是以德性与德行合一而释之。

事实恰如徐先生所言，在周初文献中，虽然有很多“德”字，但是考察它们的涵义，却未有具内在性规定者。徐先生言：

> 周初文献的“德”字，都指的是具体的行为；若字形从直从心为可靠，则其原义亦仅能是直心而行的负责任的行为；作为负责任行为的悳，开始并不带有好或坏的意思，所以有的是“吉德”，有的是“凶德”；而周初文献中，只有在悳字上面加一个“敬”字或“明”字时，才表示是好的意思。后来乃演进而为好的行为。因好的行为多是与人以好处，乃引伸而为恩惠之德。好的行为系出于人之心，于是外在的行为，进而内在化为人的心的作用，遂由“德行”之德，发展成为“德性”之德。①

如《尚书·尧典》中的“克明峻德”，《诗经·大雅·烝民》中的“好是懿德”，都是在德字之前加一形容词，才能表明此德之善恶吉凶。而《尚书·大禹谟》中言：“正德、利用、厚生”，孔颖达《尚书正义》云：“‘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②从“自正其德”观之，显然是有不正之德，才需要正德，那么，此所正之德，不必然为正。

---

①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1 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9 页。

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尚书》、《诗经》、《左传》中的“德”字，仅指外在德行而言，尚未有内在德性的意义。比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言：“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又《诗经·大雅·烝民》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左传·成公十三年》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牟宗三先生认为，这三段文字中的“德”字与“中”字具有内在性与纯善性的特征，既代表了天道下贯而为性的老传统，又“开启了性命天道相贯通的大门”①，但若细致客观地分析这三段文字，其实未必如此。在《诗经·大雅·烝民》这段文字中，“德”字前加“懿”字，即说明此“德”字并非必善之德。而在《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中，“文王之德之纯”之“德”，从加“纯”字形容“德”字来看，应该也是泛言的德，而非必善之德。至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段文字，有“命”字而无“德”字，顺其上下文，其“命”字当为禀受之义，而“中”字或认为即与“德”字同义，但依古注观之，少有释为德性或德行者，多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而谓之“中和之气”。因此，这三段文字实际上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是天命下贯之义，但下贯于人并不能保证其必然至善，否则，也不需要有动作威仪之则来定命了。对此，还可以从先秦道家思想中找到证据。在先秦时期，“德”字为通用字，并非儒家专利，如《老子》中就多有“德”字，而且“德”字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但考察老子所言之“德”字，并未有必然至善之义，这显然是周初“德”字用法的延续。

因此，周初文献中的“德”字，实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偏重于

① 牟宗三著：《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 页。

外在德行，尚未有内在性规定；二是“德”字为一个中性概念，尚未有必然至善的品格。而真正赋予“德”字以内在性与纯善性的是孔子。① 但在反映孔子思想的《论语》中，“德”字却并非一重要概念，孔子是通过“仁”字来完成了对“德”字的改造。只有等孔子开发出了作为人之内在德性的仁，并通过化超越为内在的方式，使天德与仁合一，才真正实现了道德的内在化。因此，孔子并非完全顺着以往的老传统立言，而是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孔子以其仁打破了以往的老传统，赋予人以内在的道德性，此也正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处。

梁漱溟先生言：“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②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如此显赫辉煌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开创性发展，即他“开辟了一种内在的人格世界”。“此一人格内在的世界，可以用一个‘仁’字作代表。”③仁并非孔子第一次提出，在孔子以前的经典中，“仁”字就经常出现，如《尚书·金縢》中有“予仁若考”，《诗经·郑风》中亦有“洵美且仁”，《左传》中“仁”字更是有三十几处之多。但是考察孔子之前所出现的“仁”字，大多皆为“行之美名”之义，即都是指人的美好的德行，偏重于外在的表现，尚未有内在性的规定。孔子始

① 对于这一点，何元国先生在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与孔子的“德”之比较》一文中有同样的看法，其言：“在孔子之前以及孔子的时代，‘德’还是中性的。但是，我们在《论语》中却找不到这样的‘德’，那里的‘德’都是褒义的。”（请参见《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

②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页。

③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1页。

"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1]他"自主观面开启道德价值之源、德性生命之门以言'仁'",[2]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创辟之突进"。[3]

孔子对"仁"之意义的开发,是通过对"乐"之改造来完成的。在孔子以前,礼乐并称,如《荀子·乐论》言:"先王导之以礼乐",《礼记·乐记》言:"先王之制礼乐。"又言:"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上述"先王"、"圣人"即指周公,《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先君周公制周礼。"西周初年,为了维护周初的统治秩序,周公在继承夏、商两代礼乐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把礼乐作为社会控制及调节系统。在西周初年,以礼乐来控制与调节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西周末年,出现了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局面,其中虽说与周统治者的腐化堕落不无关系,但礼乐本身的局限,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4]礼是一种外在的道德强制力量,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调控社会的功能,但是这种道德的他律方式,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乐作为一种内在的控制力量,与人的道德自律相关联,能起到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礼记·乐记》言:"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言:"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外作的礼与内制的乐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即"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5]。礼乐并称,内外兼治,自律

①③ 牟宗三著:《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4 页。
② 牟宗三著:《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 页。
④⑤ 《礼记·乐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